

“ 孟子见梁惠王 ” 与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 2002年第 26卷第 12期

摘 要

孟子的“ 民为贵 ” 思想里的养民之策有很多地方是与土地和土地利用有关的 , 也牵涉到城市与其腹地的关系 , 可与西方的“ 生态足印 ” 概念同时用来研究城市的合理规模、 结构和体制。

本 文

中国传统哲学对城市规划是有启发的。在城市理论和规划理论上 , 我很希望孔孟思想能够在平等和互导的条件下与西方实验哲学接触和切磋。

上期在“ 哀公问政 ” 一文里我谈到孔子思想可以指导现代城市规划在求稳与求变中找方向 , 和在人与制度之间求比重。这里 , 我想探讨一下孟子“ 民为贵 ” 思想对城市规划的意义。

1. 引言

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人 , 那时周朝的制度虽已衰败 , 但社会结构、行为准则 , 仍是有规有矩。虽然遵从的不多 , 但无论矫情作态或是作为一种政治手腕 , 仁义道德的意识还是有些规范作用 , 社会舆论的力

量还是有些阻吓作用。孟子相信孔子所以作《春秋》乃是为了要矫正社会，因为他相信社会仍可以矫正。“……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下）

但是到了孟子的战国时代，已是纲纪全废。弱肉强食，巧取豪夺都是公开的，甚至是被歌颂的；那是人类兽性高涨的时代。苛税重役、严刑酷法都是普遍的现象，甚至被视为正确的统治方式；那是人民生存痛苦的时代。且看，孟子有生之年正是以万物为刍狗的法家学说和以功利为目的的纵横家理论流行的年代。（孟子 35岁时商鞅被秦诛，55岁时苏秦被齐大夫所杀，64岁是张仪死于魏。这些都是孟子的性善和民贵之说的历史背景。）

“性善”是孟子伦理学说的基础。当然，孟子对“性无善，无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和“有性善，有性不善，”等等的理论早有了解（告子·上），他选择“性善”绝对是为了针对那时的乱世环境。不论他的“性善”之说可否在科学上立足，在乱世中拨乱扶正，这确实是一个高贵和积极的理想。

孟子政治理论的基础是“民贵”。他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是人所共知的，但“民贵”的实质意义是保民政策。这是孟子学说的伟大贡献。保民政策的实践首先是搞好人民的生产经济，目的是使人民无冻馁之患（乃是经世济民的意思）。在饱暖的条件下，公民的教育（就是仁义礼智的教育）也就事半功倍了 [其

实，西方某些政治理想也是如此：“衡量一个社会，要看它如何对待它最弱小的群体。”(A society is measured by how it treats its weakest) 这与以经济效率来衡量社会截然不同]

我想谈谈《孟子·梁惠王》一篇中对人民生产经济的讨论，并指出一些对现代城市发展和规划理论的启发。

2. 民生与土地

《梁惠王·上》是孟子 11 篇（内 7 篇，外 4 篇）的首篇，也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孟子见梁惠王时，已经是 53 岁了。他的道德学问也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可惜过了一年梁惠王就死了）。此篇一开头就是，“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足矣...’”全篇的重点在仁义，仁义之所胜于利是因为施行仁政就会人心所归。孟子对齐宣王解释仁政，如下：

（孟子）曰：“邹人与楚人战，则大王以为孰胜？”（作者：楚比邹强大多倍。）

（齐宣王）曰：“楚人胜。”

（孟子）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疆（作者：疆作强解）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敌八，可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作者：孟子假借齐称霸天下的例子，以证明小其实也可以胜大）。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

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作者：涂作途解），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作者：凡对其国君有怨言的，都会向你通诉）。其若是，谁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近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作者：“恒产”是可以赖以为生的产业。“恒心”是持之以恒的为善之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作者：罔民是指网罗困民。这段的意思是说，“如果人民没有恒产，就没有持久行善之心，也就会行为放纵，无所不为。如果因此而触犯法律，招惹刑罚，统治者就有陷人民于网罗的嫌疑，仁人民子的统治者，哪会有这样的造法？”）。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作者：不赡是不足的意思），奚暇治礼义哉？（作者：孟子的意思非常明显：如果人民有了温饱，就可以引导他们向善。如果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哪还会讲什么礼仪？）

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仅庠序之教，申之以考悌之义，颁

白者不负戴于道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

这就是孟子的养民之策。在尽心一篇。他差不多一字不漏地重覆一次，可见他对此的重视。“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产，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尽心·上）

孟子重视民生。他认为仁政就是保民之政，也就是保证天下太平之政。保民政策的重心只有两个：与民方便，照顾疾苦。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作者：以现代的眼光去演释就是国家加诸人民身上的负担要轻，公务员的待遇要合理，市场的管理要精明但不苛刻，公共设施要利民，以及司法要公平宽恕。）老而无妻曰‘鰥’，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为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梁惠王·下）

五亩之宅，百亩之田，是民生所倚。对我们城市和土地规划工作者有特别的意义。虽然孟子时代是农业社会，人口比现在少得多，也没有很多城市，而且他的观察肯定是农村的生活与生产。但他的养民之政明确地、肯定地指向人与地的关系。而且，他的观察是很系统和

科学的，可以引用去研究现代城市人口和城市面积的合理比例，城市用地与周围耕地的比例。这些都可以用来指导城市的规模、结构和系统、土地利用的模式、基础设施的部署和城市运作与发展的管理。

有两个不同，但相关连的题目需要特别注意：土地的承载力和人口的压力。

孟子先制定养民的目标：无饥、无寒、更无告者（这些也就是仁政的目标）。然后考虑民生的现实：建宅、种植、织帛、畜禽、耕田等。再分析生产技术和方式：种些什么？养些什么？制造些什么？什么时候生产什么东西？什么人干什么活？最后，提出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政策。这养民之策完善地配合人口（人类的消费类别和数量）与土地（生态的生产力），以求达到可持续的发展（“不王者，未之有也”）。

现代社会的结构当然复杂得多，不单是老者才需要衣帛，食肉；也不单只是鳏、寡、独、孤才需要照顾。社会分工也细致得多：不再是匹夫耕之，匹妇蚕之那么单纯。但思路仍是一样：在固定的土地上可承受多少生活和生产活动量？在固定的生活与生产活动量下需要多少土地去支撑？

当然土地（也包括土地上的建设）的素质可以改变；生活素质和生产需要更会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进步而改变。但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中和特定的科技条件下，用地量和人类活动量之间的“合理”比例是有踪可寻的。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孟子时代，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匹妇蚕之，就可以维持一家八口的温饱。这是

按一家八口的生活消费和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生产量算出来的。假若从城市的角度去看，那五亩之宅就是城市的用地（包括了城市生活、生产和消费的各种用地）；百亩之田就是城市的“腹地”（即养活城市人口所需的耕地）。

今天，人类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技术与从前不同，但是我们仍要提出这问题：“要满足城市人口的生活所需，我们要用多少土地？”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要了解城市人口所需，除了衣、食、住、行以外，还要考虑娱乐、教育、卫生等需要，因为我们消耗的全部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从土地（包括陆和水）生出来的、挖出来的和抽出来的，我们的废弃物和排泄物都是要经由土地来清理、吸收和消化。

当然，有人会说“城市腹地”概念已不存在。通过贸易和运输，我们的生活消费可以从很远的产地运来，我们的产品，可以运到老远的市场，甚至我们的垃圾都可以堆置到几百里之外的地方。通过市场，哪里产品便宜就从哪里买，哪里价钱好就往哪里卖。市场经济就是要让各地方发挥它们的“比较优势”，也就是各施所长的意思：每个地方都按它的最高效率去生产，最高需求去消费。但是这个论点有很大的危险性。

3. 土地与生态

生产人类活动所需的消费和消化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废料都要用土地。可以选择的是“自己的”或“就近的”的，还是“人家的”和“老远的”的。推而广之，“人家的”和“老远的”也就是“全人类

的”和“全球的”。现有的数据显示，地球上人类的“经济”活动（也就是人类追求物质消费的活动）已有淹埋生态之势。

这里，我选用了威廉·里斯（William Rees）与麦利斯·沃克纳格尔（Mathis Wackernagel）在 1996 年《环境影响评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杂志的“城市的生态足印：为什么城市不能持续发展——又为什么城市是可持续发展的钥匙”（Urban Ecological Footprints: Why Cities Cannot be Sustainable - and Why They Are a Key to Sustainability）一文来代表西方在土地与生态关系研究比较先进的思想。以下是他们的论点。

一个自然环境的承载力（carrying capacity）的定义是它可以恒久支持的最高负荷（load）。一般来说，这概念可以用来衡量一个生物品种（species）和它的居所（habitat）之间的生态关系：即一个生物居所的承载力，在没有构成对这居所的“生态生产力”（ecological productivity）永久性损坏的条件下，能够恒久支持的最高生物人口数。

通过削减与我们竞争的其他生物，从外输入当地所缺乏的资源和利用科技，人类好像能够不断地提高地球对人类的承载力。因此，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者和规划专家就认为承载力这概念是不适合用于人类活动的——也就是说，人类经济活动可以无限度增加。

威廉·里斯的论点是，人类经济活动是整个生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类“不可避免地依赖”着（obligated dependence）这个地球生态系统的“生产力”（productivity）和其他“支持生命的各种

服务”(life support services)。无论我们的文化与科技如何进步，人类仍是个“生物与物理的存在”(biophysical entity)，无异于千万种其他生物。

我们的基本需求和文化生产都要依靠从大自然而来的能源和资源；而这些能源和物质都会全部变成降了级的废料(degradable form as waste)回到大自然去。我们与其他生物的惟一实质区别是除了“生物性的新陈代谢”(biological metabolism) 外，人类的活动还包括了“工业性的新陈代谢”(industrial metabolism)。从热力学的角度(thermodynamics) 去解释；人类的一切“经济资产”(economic capital)就像我们身体的器官一样，需要不断地从四周吸取能源与资源去维持它的生产与运作。因此，我们居所(可以从邻里到整个地球)的承载力是人类社会可以持续性发展的关键。

威廉·里斯提出一个创新性的方向去探讨人类经济活动与其居所的生态承载力的关系——我们可以不用“最高人口数”，而改用“人类可以安全地加诸生态环境的最大负荷”来作衡量。这负荷就是人口数和每人平均消费量的积数。(在生态学上，中文的“人口”其实比英文的“population”更有启发。“人口”是“人”和“口”。人的“数量”固然重要，人的“食量”(消费者)同样重要。)

明显地，通过扩大贸易，改进科技，提高收入，人类的平均消费量(特别是在西方国家)比人口数量增加得快。有人说，“这世界非但要容纳更多的人，更要容纳‘更大’的人”。有人计算过，1790年美国每人每日平均的能量消耗量是11000千卡。到了1980年这个

数字就增加到了 210000千卡（差不多 20倍）。因此，单看人口数字是不足以了解生态的负荷的。

为了强调人类活动对生态的压力威廉·里斯把生态承载力这概念倒转过来，创造了“生态足印”(ecological footprint)的分析理论。他认为人类活动对生态的压力，经过贸易和科技的介入，非再是一个“地区性居所”(local habitat)的问题，而是整个生态系统的问题。他提出的研究题目是：“需要有多少土地才可以持续地维持一群聚居在一起的人的生活与生产需要，无论这些土地是在他们居所的周围还是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他冲破了传统的承载力概念分析的地理限制。以道德的观点去看，以上的题目可以演释为：“通过贸易和科技，这批人要占用地球上多少土地去满足他们的生活与生产所需？”

为了解答这问题，新的生态经济学者(ecological economists)提出两个概念：“天然资产”(natural capital)和“天然收入”(natural income) [请参考康斯坦萨(RConstanza)和戴利(HDaLy)，1992年，《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书中的“自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Natural Capit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一文。凡是能够制造“资源流动”(resource flow)的生物、生态系统和生物或物理个体都可叫做“天然资产”。这些“天然资产”的流动就构成了“天然收入”(包括了各种类的资源流动和自然界里各形式的互相服务)。这里的关键是“天然资产”和“天然收入”是息息相关的。“天然资产”的流动制造出“天然收入”；“天然收入”的回

馈补充了“天然资产”。通过这样的循环不息，生态系统就可以不断延续。相对地，凡是需要不断消耗“天然资产”去维持的发展就是不能持续的发展。换句话说，可持续的经济就是一个可以把“天然资产”无缺地一代传给一代的经济。

维持人类活动所需的各种各样“天然收入”(即“天然资产”与“生态服务”的流动)绝大部分都是由“陆栖性生态系统”(terrestrial ecosystems, 也包括了与其相连的“水栖性生态系统”)制造出来的。因此,如果我们知道一个社会或经济体的人口量和科技水平,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要什么类别和多少数量的“天然收入”才可以保证这个社会或经济体的持续发展,继而可以算出这水平的“天然收入”所需的“天然资产”量,和这些“天然资产”要占有的地面或水面面积。这就是一个以土地作为核算单位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也即是这个社会或经济体(我们的研究焦点是城市)的“生态足印”。无论这城市是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它的“生态足印”就是它对地球“生态资产”需要的衡量。

原则上,计算一个城市的“生态足印”的办法并不复杂:

(1) 每人每年各项消费品种(例如能源、粮食、木材、金属等)的平均消费量是全国或全区的消费总额(消费-生产-进口-出口)与城市人口之比。

(2) 每人每项消费品种的消费量所需用的土地消费量 = 每人每年平均消费量 / 每单元土地的平均生态生产量

举例:加拿大每人每年用纸 0.244吨(包括包装、建筑、报纸等

用途)。除了重用和翻新外，每吨纸仍需用 1.8m^3 的木材。可持续的林业产量是每公顷每年产 2.3m^3 。因此，每人每年 0.244 吨纸的消费量要占用 0.19hm^2 的土地 ($(0.244 \times 1.8) / 2.3$)。

当然，“生态足印”并不只是消费占用的土地，也要包括处理废料和污染所需的土地（例如处理 CO_2 所需的绿地）。

(3) 整个城市的“生态足印” = 每人平均消费所需土地 \times 城市人口。这个足印的面积是指“生态生产地”(ecologically productive land)的面积。按世界资源机构(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1992年的《世界资源 1992-1993》(World Resources, 1992-1993)报告书中的定义这包括了耕地、永久性的牧地、森林和灌木林，但不包括沙漠、半干旱的草原和冰盖的土地。

当然，以上的算法仍有很多未完备之处。例如：它的分析是静态的，而且过分简化，未能包涵可持续发展的很多其他条件和因素，等等。但这些缺点都可以一一处理，无损中心概念的说服力。

如果一个城市的“生态足印”远超它的土地面积（这是指城市范围内的“生态产地”，一般比它的行政区范围的面积要少），就构成了“持续发展的缺口”(sustainability gap)，或称为“生态赤字”(ecological deficit)。

按初步计算，加拿大温哥华市的市区人口在 1991年是 47.2万。要满足市民每年消费所需的“生态生产地”是平均每人 4.3hm^2 （其中达 2.3hm^2 是要用来处理碳酸氧的排泄）（作者：这数字在近年修正为 7hm^2 ，并不包括约 1hm^2 的水面积。）因此，温哥华市的“生态足印”

达 20万 hm^2 ，或是 2000 km^2 。温哥华的城市行政区面积是 114 km^2 。因此它的“生态足印”是城市面积的 180倍。类似地，英国伦敦市的“生态足印”是城市行政区面积的 120倍。

当然，城市只是一个国家里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很多土地是在城市范围以外，但仍可用来为城市服务（即城市的“生态生产地”）。如果我们放眼世界各国，可以有以下的发现。加拿大的国土大，自然资源丰富（也就是“天然资产”雄厚，可以带来很大的“天然收入”），可以支持它的人口消费。按 1992年的数据，平均每人分得 15.24 hm^2 的“生态生产地”（这不包括所有的土地，只是有生态生产价值的土地）。以每人平均需要为 4.3 hm^2 来算，全国人口的“生态足印”与全国的“生态生产土地”比较仍有盈余（15.24 hm^2 -4.3 hm^2 =10.94 hm^2 ）[要注意，由于加拿大不断增加自然资源的出口（例如能源、林业和渔农），它的“天然资产”正在不断下降。加之，由于生活方式改变，加拿大人民的平均消费不断上升，因此盈余也不断地下降。有人重新计算加拿大平均每人所需的“生态生产地”，认为是远超过 4.3 hm^2 ，而接近 7 hm^2 了。]

其他国家可没有加拿大那么幸运了。差不多所有欧美国家都有“生态赤字”。美国的赤字是每人欠 2.29 hm^2 。西欧国家人民的消费量比较低，但每人仍需占用 3 hm^2 的“生态生产地”。西欧国家的面积与人口的比例比较小，其中赤字最高的是荷兰，每人欠 2.85 hm^2 ，最低的法国也要每人欠 2.22 hm^2 。日本的消费量比欧美要低，计算是每人仍要占用 2.5 hm^2 的“生态生产地”。但同时日本的“生态生产地”

量也少，平均每人只能分得 0.24 m^2 。因此，日本的“生态赤字”是每人欠 2.26 m^2 。也就是说，它的民生所属的“生态生产地”是该国家所有的“生态生产地”的 10 倍多 ($2.5/0.24=10.4$)。从全球的角度来算，平均每人可分得 2 m^2 到 2.2 m^2 (分别在是否包括维持生物多样性所需的保留地) 的“生态生产地”(陆地和水地)。

从“生态足印”的观点去看，20 世纪的城市和工业集中地生存和扩张，实在有赖不断地扩充它们的“世界腹地”(global hinterland)。通过贸易和自然界里的生物、地质、化学循环，城市和工业区广泛地占用了地球上非城市和非工业区域的“生态生产地”。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没有一个城市或城市化地域可以单靠自己去维持可持续发展。同样地，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可能用“生态赤字”去维持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所有的国家或地域，都要靠进口别人的“天然资产”。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角度去看，这个论点的逻辑结论就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是世界腹地的可持续性使用。”它们这个结论是有点无奈的，因为他们的城市大部分已与城市周围的土地脱离了腹地的关系，它们只可以依赖别人的土地，也可以说西方城市的腹地是全球性的，所以西方国家要不断教训别的国家保护生态，为的是它们的生存，有赖于此。

4. 结语

中国的国情与西方不同的是我们的城市和与其相连接的腹地之间的关系并未曾被完全破坏(但破坏程度已很严重，破坏速度也不断加快)，绝对需要保护和发挥它的作用。

城市肯定改变天然的生态循环。城市化把人口与支持这人口的“生态生产地”分割。这影响了在耕地上和林地上的磷、氮、营养料和有机物的天然性回馈。那些原本是地区性的循环变成了全球性的。举例来说，城市人口把种植土地的矿营养素拿了过来，消化后的“废物”排到海里或河里。种粮的土地就没有这些“废物”去回补，耕地素质下降，要采用不能更新的化肥。因此，这些“天然资产”的消耗也就是城市化的隐形成本。城市与周围腹地越脱节，成本就越大。相反，城市与它腹地的关系越紧密，它的生态效率（这会反映在它的经济效率上）也越高。

我们不一定能扭转世界趋势，但可以自我检点，以减低中国城市对生态的压力，籍此延长我们可以用来适应的时间，增加我们适应的能力和开拓我们的适应机会。保护城市周围腹地是持续经济成长的先决条件。

实质上，西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中国孟子的养民之策是不谋而合的。西方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布伦特兰（Brundtland）的《我们的共同未来（*Our Common Future*）》报告书上是非常清楚的：这一代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模式不能减低下一代的发展机会。这定义连接了生态与道德：合乎生态的发展，也就是合乎道德的发展。正如上文所说：“需要不断消耗‘天然资产’去维持的发展是不能持续的。”西方社会经济发达，物质消费太高，消耗的“天然资产”太多，占用了地球上别人赖以生土地以及属于下一代的资产。因此，可持续的发展就要可持续地使用土地，尤其是别人的土地（世界腹地）。发达国家

要持续发展就要“学习生活得简单些，好让别人有机会生存”(Learn to live more simply, that others may simply live.)——要到全世界的人都能解决温饱时，西方的发展才能持续。因此，西方的思路是从生态入，从道德出。

孟子的思路发于仁政。仁政就是养民、保民。养民者就是要人民安居乐业，“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保民者就是使老者无冻馁，鳏、寡、孤、独者有所养。在这基础上，人民才可以明礼仪，知廉耻。因此仁政就是解决人民的基本物质需要，然后满足他们的精神生活。这些，都是需要土地去维持的。孟子的思路就是从民生到土地。“五亩之宅”、“百亩之田”是完全针对了人口压力和土地承载力而做出的可持续的养民之策。因此，孟子的思路是从道德入，从生态出。

东方传统思想与西方现代理论是异途同归。我们需要有足够的物质基础才可以开发我们的精神生活，这物质基础是可以用土地面积来演释的；我们要限制消费需求才可以持续发展，这消费需求也是可以用土地面积来演释。“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和“生态足印”就像一个土地使用量的“括号”的两端。这括号内是由民生之必需开始到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极限为止。这括号外的一端是民不聊生的残酷世界，另一端是消费过度的自取灭亡。

孟子时代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当然不同，但民生的所需仍是系统地调查和分析出来的，土地的生态生产力也可以科学地算出来的。“生态足印”理论里的“生态赤字”和“生态盈余”，可以用来综合孟子民生所需的概念（合乎道德的最低消费）和西方可持续发展的

概念(合乎生态的最高消费)去研究城市与其腹地的合理关系和腹地转为城市用地的合理取舍与比例。在宏观的角度上这些研究结果可以指导整个城市系统的部署和个别城市的规模。在微观上,研究成果可指导市内土地利用的布局,建筑物的位置和设计,绿地的部署和“城市内农地”的开发。

5. 后记

中西方的思路有一重要分别,需要注意。西方可持续发展思路中有这样的一个忧虑:私利的追求将是生态的最大敌人。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公用草场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英国农村社会有“公用草场”的制度(很多农村后来演变成城市,“公用草场”也变成了公园),村里的人可以在“公用草场”里牧羊。在每个人都追求最高私利的社会里,每个村民都会这样想:“如果我不在‘公用草场’放羊,这免费的草料就会让别人的羊吃掉”。因此,每个村民为了争取这不用付钱的利益就多养羊。羊与草的比例就歪曲了。草吃光,羊也饿死。结果是“公用草场”被破坏了,而每个村民也赔了本。在自由追求私利的社会里,公益有时变成了公害,创出“互败”(lose-lose)的局面。

私利的社会里,人民会自暴自弃。孟子说:“言非礼义,谓之自暴。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离娄上)。英国的“公用草场的悲剧”是私利作祟,使人民“旷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村民们不能好好地自我约束,安安稳稳地去享用公地;反去走尔虞我

诈的歪路，误用和滥用了大家的“天然资产”。

孟子的性善理论乐观地强调恻隐之心（仁），羞恶之心（义），恭敬之心（礼），是非之心（智），都是“人皆有之”（告子·上）。问题在如何去引发和鼓励这些善性。我认为孟子已经给了我们答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意识是很适合用来引发政治上的善性。孟子批评当时君主的独裁和贪婪只会使人心向背。相反地，以民为贵和与民分享的仁政，一定会使人民心悦诚服。

他引用了周文王和齐宣王对“囿”（畜禽兽之所，大的叫苑，小的叫囿。这里可引用来形容国家土地资产）的不同管理办法去解释仁政和非仁政的分别。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齐宣王）曰，‘若是其大乎！’

（孟子）曰，‘民犹以为小也。’

（齐宣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作者：以上是论齐宣王不明白为何周文王拥有的囿比他的大得多，但人民反而不觉得其大。）

（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豢者往焉（作者：伐樵采薪的可用），雉兔者往焉（作者：行猎可用），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

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弑其鹿者阱如弑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

不亦宜乎？”（作者：孟子说他到了齐地，问及什么是大禁，方知道在方四十里的囿内，杀鹿的按杀人论罪。那么，这四十里的囿岂不是人民的陷阱。人民认为它太大，也是很合理的。）（梁惠王下）

我们要注意，孟子说的“囿”，不是英国式的“公用草场”。在制度上，囿的产权属于君主。但在“民为贵，君为轻”的意识下，它实际上是君民“共同使用”。产权便带有“托管”的意义。这是一个巧妙的组合——明确的产权约束着共享，也避免了英国式“公用草场”的被滥用，这做法可供现代民主制度下“公产”管理作参考。

中国土地国有（也包括了集体所有），但在实际上很多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都把它们负责管理和使用的产业（这里可以包括土地和建筑物）看作它们的“私产”。这些“私产”很多时候包括了公共建筑物、公园、马路等人民常用和必需用的地方。但负责部门却常常以自己的方便和需要作为管理和运作的原则，不考虑民生的方便和保障，甚至会把这些产业当作自己的生财工具。在“民为贵，‘部门’为轻”的意识下，这些产业实在只是“托管”的，真不该是这样的局面。

当然，关键是“民”的定义。在孟子的“仁政”理想中，民与民生是一致的。“民为贵”就是把民生放在第一位。互相尊重和互相约束的“民贵”社会，可以接通政府对人民的信任与爱护和人民对政府的爱戴与支持，创出“双赢”（win-win）的局面。